

书林漫步

托译言志:严复十部译著翻译动机考述

□陈友良

在晚清思想文化版图中,侯官人严复、林纾的翻译成果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康有为曾题诗“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赞誉他们。严复一生秉持“工匠精神”,精心选译西书,引入欧洲进化论、逻辑学、政治经济学等学说,启蒙与推动了中国的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

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译八大名著”外,他还翻译了两本汉学著作,即《支那教案论》(中国教育议)。严复为什么要选译这十本西书呢?从其译序、按语、友人通信等文本中,得窥其“托译言志”之一二。

《支那教案论》是严复的第一本译著,原著是英国人密克夫的《Missionaries in China》,于1891年发表。严复1894年已译出,早于《天演论》的翻译,1899年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馆出版。严复称该译是当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饬令下的翻译任务,就原书的价值而言,“此书尚是一人一吋见解,不比他种正经西学”,但书中关于中西方文化和宗教冲突的原因分析,“其言真洞见症结矣”。针对清末民、教不和的时弊,密克夫建议,对于西方人士而言,应有所变通,汲取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的教诲;而对于中国人而言,摒弃“夷夏之防”“邪正之辨”之类的顽固观念也是必需的。

《天演论》居于“严译八大名著”之首,译自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进化论与生理学》。1895年夏季,严复开始翻译,到1898年修订完毕,并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斋出版第一个通行本,“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天演论》的成功其实出乎严复意料,若以他所撰“自序”来看,其翻译动机有三点:其一,“书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因此国人可以不必鄙视西学;其二,“西学之问,涂日多”,国人须认识到西学亦是自成体系的高深学问,不仅仅是“象数形下之末”;其三,“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即书中

亦有不少“自强保种”的理论,有助于解决中国危机。

《原富》就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著出版于1776年,严复于1898年3月开始翻译,至1902年全部译出,交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馆出版。严复所撰“译事例言”说明译书的四条理由:一是读过去的经典名著,可以温故知新;二是书中指陈的英国经济政策迷谬,与中国的情形有类通之处,可资借鉴;三是书中关于欧亚交通,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文章的论述,亦足资考镜;四是该书说理清晰,论据充分,利于学习。这可以解释严复为什么要翻译一本距其时代120年左右的经济学旧书。

《群学肄言》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原著于1873年出版。严复早在留学归国后不久(约1881年)阅读此书,大受启发,认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1903年严复译完全书,交由上海文译书局出版。在序言中,严复指出这本书是研治西方社会科学的门径和导论,“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其次,他更为明确说明翻译此书的现实动机,其实是希望从事革命或改良的社会运动者,都应通过这本书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然后慎重行事,“则何如其稍重,而先咨于学之愈乎!”

《群己权界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On Liberty》(今通译《论自由》),原作发表于1859年。严复从1899年至1903年间将其译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间还有一个波折,就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严复的初译稿遗失,为一西方人士获得,幸能完整归赵。对此译稿的失而复得,严复感叹:“呜呼!此稿既失而复得,将四百年同袍待命于此者深,而天不忍塞其一隙之明欤!”当时国内“自由”学说渐成一股社会思潮,守旧派“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激进派则

“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可见,值国人对于“自由”学说的错误见解和鲁莽实践之际,严复尝试以学术真诚纠正时论偏颇。

《社会通论》系据时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甄克思所撰《A History of Politics》一书翻译而来,1904年由新近成立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严译作序的夏曾佑直言:“今日神州之急务,莫译此书若。”严复自撰《译者序》说明译书的理由:此书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图腾”到“宗法”,再到“国家”,各个民族演化的速度或快或慢,必须经历这三个阶段。所以,变法人士需要研究中国社会进化缓慢的原因,特别是从宗法社会向近代国家的进化,欧洲国家仅用了五百余年时间,而中国浸淫于宗法社会至今已逾四千年,“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为无因之果,而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

《穆勒名学》今通译《逻辑学体系》,原著于1843年问世,作者亦系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1900—1902年间严复翻译出上半部,1905年交金陵金粟斋出版,但后半部始终没有译出,据其自述,因穆勒原书精深博大,自己又耽于人事及精力有限而未续译。严复在译著第一条按语中透露出两层翻译动因。其一,逻辑学是所有学问,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研究人们心智活动的科学方法;其二,他对已有逻辑学中译本均不满意。此外,严复在许多场合下都一再表达中国士人在学术研究上有逻辑缺陷,如“学术概念不明确,推理不严密”,“诗云‘子曰’”治学方法等。这应是他辛苦翻译《穆勒名学》的学术与现实交织的动因。

《名学浅说》为英国哲学家耶芳斯撰述的逻辑学通俗读物。原著出版于1876年,严复于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严复自撰一小序,可由此了解其翻译缘由。严复

指出,《穆勒名学》艰深难懂,正好女学生吕碧城来讨教,需要一本较为浅显的逻辑学教科书,于是应其所请,为其边讲边翻译,历经两月而书成。但此书并非经典著作,之所以要翻译,严复表示也是希望多做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

《法意》今通译《论法的精神》,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著,出版于1748年。原书共三十一卷,严复只翻译了二十九卷,且系由英文译本转译。严复翻译此书或始于1903年,脱稿当在1909年。对西方法治的兴趣,或许来自早年严复的留学经历。他在一则《法意》按语中记述了他留学时期曾在课余到伦敦某法庭旁听审判,为英国司法制度所震撼的情景,“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可见,欧洲的富强与其法制体系有莫大关系,这个信念应是推动严复去翻译这部法学经典的动力之一。但这部伟大的著作已有张相文译本《万法精理》,严复深感不满,他告诉友人说:“其书致佳,惜原译无条不紊。今特更译,定名《法意》。”

《中国教育议》是德国来华教育家卫西琴博士所著,严复于1914年初将此文译出,乃最后一部译著。严复撰有《译者案》一段,叙述其翻译缘由:卫西琴登门造访严复,送书求译,但起初严复不为所动。直到某日清晨,严复读到其中内容“推尊孔氏”“倡成己之说”“教育之感,首官能以达神明”等,“愈读愈惊异”,感到有必要将这位外国教育家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观点译出,让更多人“知有此议,以之详审见行之法之短长,其益吾国已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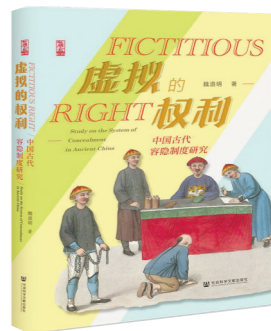
总之,严复选译西学著作的背后均有深邃的学术志向,以及针对清末民初民族危机的“救世心”。这说明严复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新书纵览

《虚拟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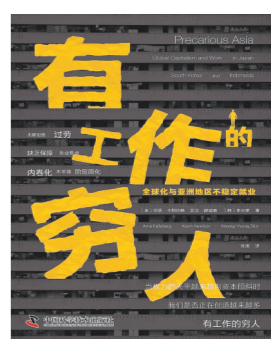
魏道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容隐是指庇护亲属的犯罪行为,帮助其逃脱法律制裁。这种因私废公的行为被确定为法律权利,若在主张个人权利为国家权力之本的近代社会,尚属正常,但出于强调君权至上的中国古代,则显得有些超前,不合时宜。那么,在中国古代社会,设立容隐制度的目的何在?容隐行为的正当性是否会被真正认可?容隐权究竟只是法律层面上的虚拟权利还是有司法保障的实际权利?本书依据法典及其他文献的记载,以清代为例广泛搜集75条生动的案例,对容隐制度发展轨迹和司法实践进行梳理。

《有工作的穷人》

阿恩·卡勒伯格 等著 张凌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评估了全球和国内因素对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不稳定就业及其产生的影响。作者通过将宏观层面的政策、中观层面的劳动关系和个体工人的微观经历联系起来,揭示了催生不稳定就业的错综复杂的力量,并在此过程中将历史、制度分析与有关资本主义和阶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相结合,说明不稳定就业最终如何导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并使部分人口陷入长期贫困,令更多人的生活收入和朝不保夕。

《学历之死》

赫布·柴尔德里斯 著 杨益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零工经济席卷而来,冲击着大学教职的分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学教授的工作已经被彻底改变了,而且是更糟糕的改变。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旨在为学生服务,并通过终身教师的长期工作、研究和稳定来创造知识,但今天的高等教育已经逐渐被兼职人员所主导。调查显示,多达70%的美国教授在课程之间疲于奔命,工资极低……这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青椒之困”——当年轻博士顺利毕业,走上讲台正式试图大干一场时,猛然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兼职的讲课机器,捧着早已规划好的课程大纲教授通识课程,照本宣科下拿着居于最低水平线的时薪,按课缔结的一纸合约无法给出任何保障,非升即走是常态,而长聘教职则遥不可及。作者指出,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的许多力量共同推动了这种转变,当我们把教育工作者当作绝望的临时工来对待时,怎么能说自己重视高等教育呢?

《被互联网辜负的人》

杰西·林格尔 著 冯诺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强加《用户协议》,引导无意义的点击、停留、互动,互联网平台有很多工具吸引、利用和剥削用户,但贡献内容、人气和数据的用户对平台如何运作却没有约束力。20年间,互联网如何从屠龙者变成恶龙?互联网如同遭遇绅士化的老城区,变得更加便捷、光鲜但缺乏多样性,有明确优先服务的人群,极端重视利润而轻视社群,急着把最初搭建社区但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群边缘化甚至扫地出门。本书巧妙地拆除了科技巨头的浪漫化概念,帮助读者理解互联网是一个日益孤立、商品化、被监视和失所之地。

五大名士点赞《黛韵楼遗集》

□陈蓉 高颖颖

中国近代传统士人朋友圈流行一种点赞方式,便是为其著述的书名题签。在近代“晚清风流人物数侯官”的文化景象中,涌现出一批颇负盛名的福州“才女”,产生了许多极具标志性的作品,不仅广受时人追捧,更为后世流传称颂。薛绍徽便是福州“才女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由其后人整理出版的《黛韵楼遗集》在当时备受推崇。

文集共分四册,封面由姚华题签,扉页则由严复题签;一二两册为《诗集》,集名由陈宝琛题署;第三册为《文集》,集名由陈衍题署;第四册为《词集》,集名由林纾题署。姚华、严复等人皆为当时的名士硕学,他们为何纷纷为薛绍徽点赞呢?

薛绍徽(1866—1911年),字秀玉,号男奴,福建侯官人,著名女作家、翻译家。她出身于传统的贡生之家,幼时受其母亲邵儒人影响,学习琴棋书画,常与母亲诵吟古诗。9岁时家庭突遭变故,三年内父母先后离世,但这并没有阻碍薛绍徽才华的显露。14岁,薛绍徽假借哥哥的名字参加福州诗会,其诗作被评为上选而名扬当地。15岁的薛绍徽曾题诗章钜的《闽川闻秀诗话》,词末两句“只今光禄无新派,玉尺空山冷暮岚”,以此道出了其复兴传统才女文化光禄诗派昔日荣光的志向。

闽川才女文化源起明初,成于明清之际,盛于清朝中后期,以福州妇女“光禄诗派”为其社团基础,魏晋“贤媛”传统为其思想资源,二者经由母教传衍,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有贡献。但近代的中国则对薛绍徽

等晚清才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们不仅要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更要能够接受来自西学的挑战,不能仅做安安静静传统才女,还要能做时代弄潮儿的现代才女。

薛绍徽之所以能获得严复等人点赞,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她受其夫人的影响,共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1880年,薛绍徽与陈寿彭喜结良缘,开启了传统才女的西学之旅。薛绍徽自谓“不解西字”,甚至陈寿彭在婚后计划留学日本和英国,她都表示异议。比如薛诗:“我闻瀛洲地,弱水无浮桥。神仙久不作,雕题相并吞。素人误女国,徐市遣子孙。已乏药饵灵,安有典存存?”“侧闻大秦图,已越白浪河。胡风吹桦栗,羌女戴雪花。射生木马上,羲暮时相过。八月见积雪,冻柳僵枝柯。习俗与世界,文翰非吾阿。”均表达了对其夫君赴日英留学的疑虑。但薛绍徽这样一位传统的才女,在丈夫陈寿彭、夫兄陈季同等人西学的影响下,逐渐转变了对西方文化的看法。

陈寿彭,1855年出生,侯官人,受其胞兄陈季同影响,亦入船政学堂学习7年,主修英文和轮船驾驶。可以说,陈季同、陈寿彭是在船政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1885年4月,陈寿彭作为船政第三届学生被派留英三年。其间,他常将国外新奇产品寄回,逐渐改变了薛绍徽对国外的认识。比如薛绍徽文集中写道“但脉脉闻声相和,瞬息能分时候,机轴中,含精金外溢”,表达了在接触瑞士机械表后颇感震惊的感受;“绎如又用化学法蒸百花为露……

无以赞其妙”,对陈寿彭用西方化学方法酿酒大为赞叹;“尽鸣(音如决,即伯劳鸟,鸣声嘈杂)音旁行斜撞。玉轴金题吾不识,记羊皮贝叶微触”,表达了对丈夫归国携回的600册西文图书的浓厚阅读兴趣。

1897年11月,时任上海电报局长经元善发起女学运动,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女学舍、第一所女学堂和第一份女子刊物《女学报》。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等维新主力都是女学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特别是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长期担任《女学报》的主笔,其中陈季同的法国妻子赖妈懿也积极参与其事。

根据当时的报道,薛绍徽在夫嫂等女学运动发起人的影响下,免费定期为该报刊稿,很快成了《女学报》的第一主笔。薛绍徽反对女性无用论,重新阐释了妇德、妇言、妇工、妇容的内涵,强调女性的学识、才艺和在学术、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此时的薛绍徽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但她仍然认为女学须以礼教加以规范,但可以看到她已经开始接受并传播西方现代社会生活的方式。

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女学报》也随之停刊。但薛绍徽却已经不再是原来只会吟诗作对的传统才女,她已经接受并喜欢上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1900年,薛绍徽和陈寿彭合译的中国第一部科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由经文社刊行。原作者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薛绍徽则根

据英文版《Eight Days Around the World》进行翻译。薛译本文字精练,忠于原著,批注翔实,使其在出版后大受欢迎。此后,薛绍徽与陈寿彭继续合作,接续翻译了《格致正规》《外国列女传》《双线记》等作品,也在国内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此时的薛绍徽通过翻译小说等方式,向中国社会各界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

1907年清末新政期间,陈寿彭任邮传部的主事,薛绍徽受其影响也参与到了立宪改革的浪潮,其间写下了许多描绘京城各界对新政期望的诗歌。然而,清末新政以皇族内阁的成立而草草收场,更是引发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不满。薛绍徽经此政改,目睹朝野分歧,彻底对满清政府失去了信心,这种情绪在她的最后一首长诗《前门观灯台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于1910年11月7日)。她不像清末一些士人因对政治失望而寄情山水吟诗作对,反而通过长诗呼吁“君民合义”的君主立宪制,为民求福。此时的薛绍徽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诉求,并通过诗歌来传播自己的政治思想。

薛绍徽通过办报、翻译科学小说,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使她从传统才女转变成现代女学运动的代表,成为冰心、林徽因、庐隐等之前,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闺籍女作家、女学者、女艺术家。这也正是在薛绍徽病逝后三年,由其家人出版她的文集《黛韵楼遗集》四册时,姚华、严复、陈宝琛、陈衍、林纾等纷纷为薛绍徽点赞的缘故。

新书点击

闽粤滨海社会图景的多维度展陈

□刘泽华

杨培娜新著《生计与制度: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秩序》以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生活为研究背景,在“王朝之制”和“民间之俗”的互动中,以王朝统治秩序的确立及演进为研究主线,以滨海人群为研究对象,把以土地开发、海界圈占、渔业捕捞、海外贸易等为基础的滨海社会组织形式和王朝国家的统治秩序相结合,继而把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秩序的流变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更可靠的运作机制下,探出闽粤滨海社会的多重力量如何在冲突、妥协、共谋中逐步消解对中央王朝的政治疏离感。

全书大致可分四部分,论析了明初闽粤滨海社会的卫所户管理制度及组织结构,其亦是明代滨海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制度;阐述了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的生计形态及明中后期闽粤滨海社会的准军事化管理进程;论述了明清易代之际闽粤滨海社会的战局态势等问题,主要围绕郑氏集团与“粤东三总兵”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抗衡而展

开;描述了清前中期闽粤滨海社会边防体系的调整及裁撤卫所的后世影响。

作品以滨海社会的组织结构及滨海人群的生计形态等为出发点,重点考察了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秩序的确立及演变过程,正如杨培娜所论:“一方面,国家管理从移植既有陆上定居农业管理模式向适度尊重滨海生计特点、控制流动性的策略转变,管理机构则从卫所、州县、盐场和河泊所并存的复合交叠架构逐渐转为以州县为依归的单一行政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在滨海人群生计模式、组织秩序与王朝体制的冲突、妥协与共谋中,滨海地域逐渐形成‘垄断(资本)一依附(雇佃)社会经济结构’,滨海地域政治疏离感日渐消解。”

作者用“明清”“闽粤”“沿海”“漳潮”“卫所”“户籍”“渔盐”“生计”等数个语词串联全书的整体内容及结构框架,又运用大量史料阐释问题,把撰述建立在严谨的科学研究上,尽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用细致、扎实的考证厘清了明清闽粤滨海社会

秩序及人群的生计形态等诸多问题,全面展现明清闽粤滨海社会图景。

明中后期以“垄断(资本)一依附(雇佃)”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及军事活动在逐渐加强,同时在多重力量的冲突、妥协、共谋中,滨海人群开始消解对中央王朝的政治疏离感及疏离状态,中央王朝实现了对闽粤滨海社会空间的重塑与再造。全书以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的运行规律、实践活动及滨海人群的生计形态等为出发点,旨在考察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观念的确立及演变过程。

刘志伟在书序说:“过往的史学研究,虽然对海上交通、海上贸易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丰富的成果,但基本的历史框架,仍然是从一个农业文明稳守自身的内在秩序、通过海上通道从外部世界获取稀缺资源供给的角度展开的。”跳出以国家为历史活动主体的王朝史观,将视线落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从滨海地域千

万万的人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着眼,我们看到的场景就完全不同了。”

作者跳出原有的区域史研究模式,独辟蹊径,再结合历史人类学等的研究视野,从作为能动者的人及人的生存、发展等视角出发,试图去发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重要史料信息,正如作者所说:“将这一方法称为逆读史料,即在充分理解文献资料字面意思、作者撰写意图和史料文类特点与形成机制的前提下,结合田野经验和自己的关注,解读文献史料中真实蕴含的但非作者主观上打算表达的信息,抑因为文本制度、格式而被扭曲表达的信息。”

基于对“我们如何才能理解这些真切切切存在但在历史记述中失语、沉默的人?历史的书写有时候对普通人来说过于冰冷……何尝不是时常只见标签不见人”的深刻反思,作者得出“文字记录内在蕴含的权力关系与知识框架所具有的偏见和盲点,是需要我们警觉和反思的”这一论断。